

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個案： 上海「反復辟學會」(下)

• 董國強、樊建政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四節已於2019年6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五至八節。

五 「反復辟學會」：「毛主義」情結的強化

伴隨各地「奪權」行動而來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和群眾派性鬥爭的升級。為了控制與約束日益失範的群眾運動，中央於1967年1月底決定派軍隊介入地方文革運動。然而，2月中旬北京發生「懷仁堂事件」，加上各地駐軍在2、3月間普遍對造反派實施「鎮反」，使毛澤東對軍方的政治忠誠心存疑慮，感到有必要在軍隊和造反派之間保持某種均勢。於是中共中央在4月1日公布〈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強調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①。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②。6日，中央軍委頒發〈中央軍委十條命令〉，重申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的主要精神^③。

在此背景下，捲入上海「一·二八炮打」事件的復旦大學造反派在4月初陸續獲得「解放」，歷時兩月有餘的「反逆流」運動不了了之^④。「陳秀惠們」當然不了解導致這次政策反覆的真實原因，但這次反覆使他們對最高當局的感恩戴德之情有增無減，也激勵着他們繼續忘我地投身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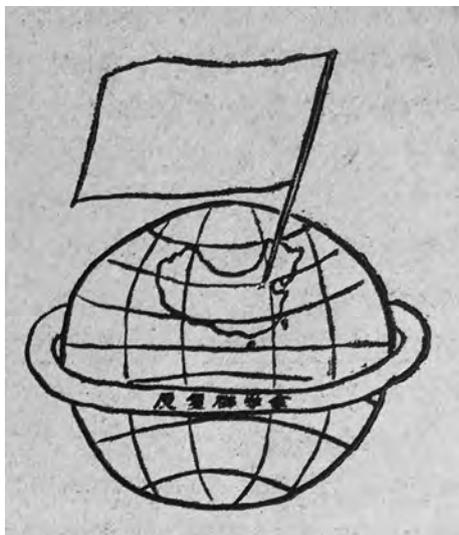
當時官方輿論宣傳正在掀起新一輪針對劉少奇等人的批判運動，繼續為文革正名和造勢。陳秀惠等人聞風而動，迅速以「反復辟戰鬥小組」名義撰寫了一批文章，闡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必要性和歷史功績。4月5日，他們撰寫〈國際的希望在中國——紀念毛主席的馬列主義文獻《炮打司令部》發表八周年〉一文，簡單列舉國際共運的幾次挫折，宣稱「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變成修正主義的教訓，而沒有社會主義不出修正主義的經驗」，「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歸根到底就是要製造出『炮打司令部』的經驗」^⑤；20日，撰寫

〈偉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雷鳴——熱烈歡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誕生〉一文，宣稱：「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總結了巴黎公社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正面的經驗和反面的教訓。以他雄偉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膽略，在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⑥

為了更好地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陳秀惠等人決定發起成立「反復辟學會」。關於該學會的成立背景和初衷，陳秀惠在一份回憶資料中談到^⑦：

六七年七月下旬前後，正值盛夏季節，幾乎每天夜晚，我和「反復辟戰鬥小組」以及班上其他同志一起乘涼座談。大家回憶一年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歷程，激情滿懷，感慨萬千，體會很多很多。同志們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熱情歌頌了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談到蘇聯變修的原因時，都感到在我們這樣一個八億人口的大國普及毛澤東思想是避免走蘇修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證。還談到了毛主席的偉大革命實踐，其中也談到了「新民學會」，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朗誦起毛主席的光輝詩篇《沁園春·長沙》：「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當時同志們都有這樣的想法，搞教育革命的時候，應以「新民學會」為光輝榜樣。

1967年8月5日，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當天，陳秀惠等人在復旦大學大字報欄裏貼出〈「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草案)〉(以下簡稱〈創立宣言(草案)〉)，標誌着「反復辟學會」正式誕生。陳秀惠等人在〈創立宣言(草案)〉中宣稱：「全世界進入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改造人們靈魂的馬列主義，是無產階級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大立偉大的光焰無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關鍵！」「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如何運用毛澤東思想？如何傳播毛澤東思想？這是反對和防止人頭滾滾落地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迫切任



「反復辟學會」大字報專欄報頭。(圖片由樊建政提供)

務！……這是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只有善於應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大革命的學說，一邊搞運動，一邊搞理論，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做出合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論性創造，才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根本意義所在。」^⑧

他們還致信中央文革小組，申明「我們是復旦大學『反復辟』戰鬥組，我組很大一部分同志都是去年六、七月份從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革命小將，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從小熱愛毛主席，從小熱愛共產黨。我們學會說話的第一句就是『毛主席好！共產黨好！』學會寫字的第一句就是『毛主席好！共產黨好！』。現在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哪怕太陽熄滅了，地球不轉了，

信仰毫不動搖！」「『反復辟學會』是我們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一種組織形式。我們利用業餘時間，交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交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有利於本單位的鬥批改，一句話，有利於共同學習，運用和傳播毛澤東思想，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進行到底。」「請首長同志放心，我們要發奮『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誓作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永遠作勞動人民忠實的兒子，勝利擔任我們時代的重任，我們正沿着毛主席開闢的共產主義勝利航道，奮勇前進！」^⑩

在此前後，他們還分別向毛澤東、江青等人和「兩報一刊」編輯部、上海市革委會發出內容大同小異的信件，一再表明對最高當局的政治效忠，積極爭取有關各方的幫助和支持^⑪。

六 「理論研究」：官方輿論宣傳的緊跟與翻版

「反復辟學會」自我定位為一個以「理論研究」為鮮明特徵的造反派群眾小團體。陳秀惠在〈創立宣言(草案)〉中提到：當時中國面臨的兩大任務是「埋葬美帝，踏平蘇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在中國如何反對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完成兩大任務的前提和關鍵是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並「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做出合乎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論性創造」^⑫。他還在另一份材料中提到：該學會從事「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是「以研究現狀為主，研究長期的帶規律性的問題為輔」。近期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從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尤其是中國的國情入手」，研究「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革命的偉大學說」；二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中不斷暴露出來的帶有實質性的問題」。具體工作是圍繞以下主題展開專題論述：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劉少奇；劉少奇修正主義的由來和發展；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群眾運動^⑬。

目前能夠看到的「反復辟學會」的言論材料有五大用途，近四十篇(表2)。這些材料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創立宣言〉(草案、修正草案)、〈「反復辟

表2 《「反復辟學會」言論集》目錄和文章用途

篇名及用途	時間	篇名及用途	時間
創建學會			
〈「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草案)〉*	1967年8月5日	〈「反復辟學會」章程(草案)〉	1967年8月
〈「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修正草案)〉	1967年8月	〈「反復辟學會」的請示報告(草案)〉*	1967年10月10日
〈「反復辟學會」總綱(草案)〉	1967年8月	〈徵求「反復辟學會」報頭〉*	1968年1月6日
說明情況			
〈致中央文革的同志們的信〉*	1967年9月	〈致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信〉*	1967年9月

〈致《紅旗》、《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編輯部的信〉*	1967年9月	〈致徐特立、蔡暢同志的信〉*	1967年9月
〈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辦公室的信〉*	1967年9月	〈「反復辟學會」情況介紹(草案)〉*	1967年10月10日
宣示己見			
〈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變〉*	不詳	〈偉大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燈塔〉*	1967年10月6日
〈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嘴臉〉*	不詳	〈必須研究「清君側」〉*	1967年10月14日
〈「一月革命」必須繼續進行〉	1967年8月	〈炮打私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1967年10月16日
〈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武訓傳》批判的歷史教訓〉*	1967年8月	〈論班子〉*	1967年11月初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	1967年9月	〈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劉少奇(參考意見)〉*	1967年11月2日
〈張鵬飛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	1967年9月	〈劉少奇修正主義的由來和發展〉*	1967年11月2日
〈「七月風暴」與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	不詳，推測為1967年10月前後	〈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參考意見)〉*	1967年11月2日
〈致毛主席的信〉	1967年10月1日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群眾運動(參考意見)〉*	1967年11月2日
〈致江青同志的信〉	1967年10月5日	〈舊的教育制度必須徹底砸爛〉	1967年11月17日
獻言獻策			
〈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第一稿)〉*	1967年12月	〈「反復辟學會」給市黨章修改小組的信〉*	1968年1月
〈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第二稿)〉*	1968年1月		
討論參考(翻印)			
〈社會輿論摘錄〉	1967年10月	〈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必須造人事檔案中黑材料的反〉	1967年11月8日
〈「鬥私、批修」萬歲〉	不詳，推測為1967年10月前後	〈科學縱橫觀〉	1968年3月1日

資料來源：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編印：《公布「反復辟學會」反革命小集團的一批材料(內部材料，供批判用)》，鉛印件(1970年6月)；陳秀惠提供的《「反復辟學會」言論集》(此言論集中的絕大部分文稿為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材料調查組的專案材料，言論集名稱為本文作者代擬，結集成冊的工作是陳秀惠在文革後完成的，原保存人為陳秀惠，2013年5月18日陳秀惠將此言論集贈予樊建政，並書面授權樊建政全權代理言論集的保存、使用及相關事宜)。

說明：(1) 以下信件之名稱為本文作者代擬，其原稿無名稱：〈致中央文革的同志們的信〉、〈致《紅旗》、《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編輯部的信〉、〈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辦公室的信〉、〈致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信〉、〈致徐特立、蔡暢同志的信〉、〈致毛主席的信〉、〈致江青同志的信〉。(2) 本目錄中使用「*」標注的文章作者為陳秀惠。

學會」情況介紹(草案)等，多由陳秀惠起草，目的是爭取當局的理解與支持。第二類是他們翻印其他人的大批判文章和信函，如〈在批判幹部問題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必須造人事檔案中黑材料的反〉、〈科學縱橫觀〉等；翻印意味着他們對這類文章的認同與讚賞。第三類為成員撰寫的「理論文章」，包括〈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炮打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等。

由這些言論材料不難看出，陳秀惠等人的撰述活動根本不是「理論研究」。這些文章和信函的內容和格調，無一例外地都屬於文革期間十分常見的大字報類型，只不過比一般的大字報篇幅更龐大、內容更龐雜而已；在具體內容方面，均由一些雜亂無章、隨想式的主觀論斷和姿態激進、氣勢恢宏的政治口號構成。而這些當時人們耳熟能詳的主觀論斷和政治口號，均來源於毛澤東不同時期的論著和講話、文革期間中央領導人講話，以及「兩報一刊」社論和文章。儘管這些文章和信函近四十篇，但是其內容和詞句高度重疊和同質，實際上信息量相當有限。歸納起來，它們反反覆覆、連篇累牘地申明與渲染了以下幾個主題：

第一是大力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力頌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豐功偉績」。例如〈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一文中提到：「我們的時代產生了二十世紀的天才毛主席。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對時代的前進起着最偉大、最深遠、最普遍、最深刻的決定作用。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當歸功於毛主席的理論和實踐的活動，毛主席拯救了人類，沒有他，我們直到現在還會在黑暗中徘徊。」「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成為了資本主義向上發展和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也即解決了當時世界上的頭等大事。今天，毛主席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也即解決了當代世界上的頭等大事。」^⑬

第二是大力吹捧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例如〈創立宣言(草案)〉中提到：「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優秀、最傑出、最堅定的學生，他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領會最深，是我們時代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他一貫最忠實、最堅決、最徹底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我們一定要以林彪同志為榜樣，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忠實執行毛澤東思想，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理解了的要貫徹，不理解的也要貫徹。」^⑭再如〈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第一稿)〉提到：「林彪同志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是全黨學習貫徹、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最高典範。」^⑮

第三是大力批判和醜化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為代表的「反革命兩面派」和「修正主義份子」。例如〈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嘴臉〉一文提到：「建國十八年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同反黨修正主義集團進行的三次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中，陶鑄施展了反革命的兩手，扮演了反革命兩面派的可恥角色。」「這些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敵人要比打着白旗的敵人狠毒十倍，這些披着羊皮的狼要比不披羊皮的狼陰險十倍，這些笑面虎要比張牙舞爪的老虎兇惡十倍。這些糖衣炮彈要比真槍實彈厲害十倍，堡壘是最容易從

內部攻破的，鑽進我們『肝臟』的敵人比公開的敵人危險十倍，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和高度的警惕。劉少奇是這樣的人，陶鑄是這樣的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就是這樣的人，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幕後操縱者策劃者也是這樣的人。我們必須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必須提高對於兩面派的注意力。」^⑩

第四是極力反對少數激進群眾組織將鬥爭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各級革委會。例如〈必須研究「清君側」〉一文提到：「臭名昭著的『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一個陶鑄式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大颺『懷疑一切』的妖風，運用反革命策略——『清君側』，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政權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問題，黨內走資派要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就必然首先從領導班子開刀，把攻擊目標集中於一個人或幾個人，這就是著名的反革命策略『清君側』」^⑪。

第五是大力號召各群眾組織成員「鬥私批修」，大力批判各種「資產階級思想」，試圖將日益渙散的群眾運動重新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例如〈炮打司令部〉一文提到：「一年多來，我們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下了豐功偉績，由於我們隊伍裏缺乏強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不斷侵入了戰鬥的革命造反派，資產階級世界觀在某些人中還得到了發展，這難道還不是事實嗎？」『『私』和『修』字，都是利己主義，在資產階級世界觀這點上是共通的，其核心就是一個『私』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私』司令部，把頭腦裏的劉少奇揪出來鬥！」^⑫

第六是極力為中央高層的決策錯誤及其災難性後果辯護。例如1967年春中央高層對地方群眾運動的不當干預，導致一部分激進群眾組織與軍管當局對抗，並在毛澤東錯誤處置武漢問題後形成全國性的反軍浪潮。「反復辟學會」成員對如此顯著的政治挫折視而不見，依然在〈「七月風暴」與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一文中大唱讚歌：「『七月風暴』的勝利，歸功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歸功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歸功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月革命』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和一切革命的人們，在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又經過了整整半年時間的艱苦奮鬥、浴血奮戰之後，則又出現了『七月風暴』的偉大業績。」『『七月風暴』使全國文化大革命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⑬

綜觀以上各段引文，以及上文沒有引述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武訓傳》批判的歷史教訓〉、〈論班子〉、〈偉大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燈塔〉等文章，無一例外地遵循與呼應着1960年代前期中蘇論戰以來的主流輿論宣傳，根本談不上甚麼「理論創新」。即便是後來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和批判者羅列的所謂「階級關係變動」論、「修正主義不可避免」論、「文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開端』」論、「重建共產黨」論等^⑭，也都是對不同時期中央首長講話或「兩報一刊」社論的照抄照搬。

大概唯一值得我們做些辨析的，是該學會在〈「反復辟學會」的請示報告（草案）〉中提到「群眾要掌握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他們宣稱：「毛澤東思想

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但是，如何運用毛澤東思想這一銳利的批判武器給予舊世界以毀滅性的打擊，我們的理論戰線是很薄弱的，特別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偉大實踐非常之不相稱的，也是和中國在世界上決定性之地位不相稱的」，所以「有志氣、有抱負的毛澤東時代青年，要以林彪同志為典範，為學習和運用、傳播毛澤東思想奮鬥終身」。他們還宣稱「『反復辟學會』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組織形式之一」^②，並在其他場合談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後肯定還會有大的鬥爭，那個時候肯定會有人出來修正毛澤東思想，「所以我們現在要坐下來研究毛澤東思想，掌握毛澤東思想解釋權。群眾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如果誰出來修正毛澤東思想，就能馬上識別」^②。

僅僅從上面引述的文字看，他們似乎有意對「毛澤東思想」做出某些「發展」或「自行解釋」。但是通觀他們的所有文章和信函，除了不斷重複一些當時人們耳熟能詳的空洞而武斷的命題外，並未提出任何新的看法，也未對這些命題作出獨具匠心、恰如其分的事實論證。他們提出「群眾要掌握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前提是承認「教義」的絕對權威，目的是捍衛「教義」的本真性和純潔性。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就是頂峰，就是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猛，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們的時代，誰否認毛澤東思想，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列主義，正如列寧時代否認列寧主義就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然，發展下去就會犯歷史性錯誤，墮落為千古罪人，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世界共伐之！」^③

七 「反革命小集團」：「政治模糊性」的犧牲品

「反復辟學會」這樣一個社會構成純潔、政治面目清晰、思想觀念正統的毛主義小團體，為甚麼會在1968年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迄今為止，人們對此的解釋（包括陳秀惠等人的看法）依然脫胎於當年的大批判文章和專案組結論，儘管當年和現在的「是」、「非」判斷標準截然相反。筆者認為，當年批判者的指控和專案組的結論都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該學會之所以遭到打壓，不是因為成員的思想和言行存在「反骨」，而是因為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現實政治需要。

1967年春中央高層對文革走勢的強力干預，進一步加劇了一部分造反派群眾組織與軍管當局的激烈衝突。武漢「七·二〇事件」引發的連鎖反應，使得各地依靠「軍管」措施建立起來的脆弱的新秩序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最終決定依靠軍隊力量徹底終結群眾運動。新一輪政治逆轉的標誌是中央「九·五命令」，這個命令迅速在全國各地得到貫徹執行。不過由於各地混亂局勢的慣性發展，該命令的預期效果直到1968年初才逐步顯現。

有必要強調的是，「反復辟學會」對「九·五命令」的反應，與1967年初「反復辟戰鬥小組」對中央文革小組電報的遵從如出一轍^④。他們在9、10月間連續向上海市革委會和中央高層發出信件、請示報告和情況說明，自責作為「學

生」的「原罪」（「存在唯心主義傾向」和「脫離工農群眾」），並說「現在是我們犯錯誤的時候了，我們希望得到首長的指示，希望給以必要的引導」^⑤，這顯然是對毛澤東關於「小將犯錯誤」論斷的積極回應。他們還陸續撰寫了〈偉大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燈塔〉、〈必須研究「清君側」〉、〈劉少奇修正主義的由來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群眾運動（參考意見）〉、〈舊的教育制度必須徹底砸爛〉等幾篇「重頭文章」，積極附和當下的官方輿論宣傳。然而，到1968年2月前後，隨着各地激進小團體相繼遭到批判和取締^⑥，該學會也在劫難逃。

事後看來，首先，陳秀惠等人在1967年初毛澤東肯定蔡祖泉的造反行動後依然堅持「揪蔡」；在1967年8月「反復辟學會」成立前後多次將該學會與毛澤東等人創立的「新民學會」相提並論，並批評「早請示、晚匯報」、背誦毛主席語錄、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到處掛毛主席像是形式主義，無助於「反修防修」^⑦；在1968年1月給上海市黨章修改小組的「群眾來信」中提出林彪一定要寫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公報〉、〈決議〉等文件，但不一定要寫入九大黨章〈總綱〉的建議^⑧，都為批判者提供了口實。其次，他們在多篇文章中為了凸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崇高地位和絕對權威，難免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略顯不恭，特別是對斯大林有些「妄議」；與此同時，他們在多篇文章中為了凸顯文革的必要性和國際意義，反覆強調「修正主義不可避免」，「奪權」鬥爭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下去，甚至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⑨，難免從反面否定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強大威力」，也全面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偉大成就」。再者，他們在武漢事件後撰文呼應《紅旗》雜誌「揪軍內一小撮」文章^⑩，在王力、關鋒、戚本禹倒台後當然會被認定為「反軍、亂軍」。更何況，他們在1967年初捲入「一·二八炮打」事件，肯定也是上海市革委會將他們圈定為重點打擊對象的關鍵因素之一^⑪。

1968年3月中旬，「反復辟學會」大禍臨頭。12日，復旦革委會主辦的《復旦戰報》發表社論〈行動起來，向反動思潮宣戰〉，不點名指責陳秀惠等人「極端狂妄地提出要甚麼『發展』毛澤東思想，『研究』甚麼第二次文化大革命」^⑫。13日起，陳秀惠等人遭到隔離審查。25日，復旦革委會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發出〈砸爛「反復辟學會」，揪出復旦變色龍——關於徹底批判「反復辟學會」的通知〉；同日，《復旦戰報》公布〈關於反動組織「反復辟學會」的第一批材料〉，指責陳秀惠等人「狂妄地宣稱要發展毛澤東思想」，「詆譏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盤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打着研究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旗號，進行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反奪權活動」，並配發社論〈把「反復辟學會」揪出來示眾〉^⑬。26日，《復旦戰報》發表本報編輯部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和「反復辟學會」的破產〉，並以附錄形式公布所謂大毒草〈「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草案）〉^⑭。3月下旬，復旦大學召開批判「反復辟學會」大會。4月4日，張春橋在上海市積代會上發表講話，指責陳秀惠等人：「他們講『反』復辟，實際是要復辟。」^⑮5月30日，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公布〈關於反動組織「反復辟學會」的第二批材料〉，將該學會定性為「一個同社會上各種反革命勢力有着廣泛聯繫的、代表了資產階級反動利益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

毛澤東思想的、有組織的政黨性的反革命政治派別」^⑳。從6月開始，陳秀惠等人一邊接受審查，一邊監督勞動。

1970年初，全國範圍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接踵而至，陳秀惠等人遭受的打擊迫害不斷升級。1月，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將「反復辟學會」的某些言論當作「反動思潮」，編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二稿）》^㉑；4月，被上海市委「五·一六」專案辦公室定為上海市十個「反革命大案」之一^㉒。6月，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將該學會的所謂「罪證材料」彙集成冊，印發全市各單位供批判使用。這本小冊子的前言指控該學會與北京「共青學會」、武漢「北斗星學會」、湖南「省無聯」「相互勾結又相互利用」，「成立最早，組織最為龐大，活動最為猖獗」，「在政治上以『理論研究』為口號，篡改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經典著作，提出一整套為反革命政變作輿論準備的謬論；在組織上是一個反革命大雜燴，不擇手段地網羅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壞人；在活動方式上……規定了一整套秘密活動的反革命策略和森嚴的反革命紀律」^㉓。與此同時，復旦政宣組推出《革命大批判文選》第六冊（「反復辟學會」批判專輯），組織全校各系大批判寫作組的十二篇文章，質問學會「『模仿新民學會』居心何在？」「為甚麼奢談文藝復興？」以及「陳秀惠的改名換姓說明了甚麼？」並對〈創立宣言（草案）〉、「修正主義不可避免」論、「『垂死的社會主義』和『再生的社會主義』」論進行駁斥^㉔。上述的兩本小冊子，還指控該學會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瘋狂反對林副主席」，是「地富反壞右的復仇軍」、「帝、修、反的行動隊」、「裴多菲俱樂部」、「希特勒的門徒」、「赫魯曉夫的先天信徒」、「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等等^㉕。最滑稽的是，以地球儀、中國地圖、紅星、紅旗為元素的報頭設計，被指控「充分暴露了『反復辟學會』妄圖稱霸全世界的反革命野心」^㉖。

1973年7月，上海市公檢法核心小組對陳秀惠等人作出判決^㉗。凡團員和預備黨員者一律吊銷資格；在職工人停發工資，在校學生停發獎學金、助學金，僅發少量生活費維持生計^㉘。文革結束後，上海市公安局於1978年3月做出決定〈關於對陳秀惠同志問題的複查意見〉，謂「陳秀惠組織『反復辟學會』活動中，未發現有反動的言行。陳秀惠同志是反對『四人幫』及其餘黨而受到政治迫害的。據此，按照中央（1976）23號文件精神，……予以平反，恢復名譽」^㉙。與此同時，「反復辟學會」的其他成員也獲得平反。

八 結語

我們無意苛責「陳秀惠們」的言行。如本文所述，他們捲入文革運動有着狹隘但真實的思想感情基礎；而且，這樣的思想感情也並非他們幾個人所獨有。大量歷史文獻和研究成果顯示，人們對文革的幻滅與覺醒都需要經歷一個過程，普遍的社會心理變化發生在文革中後期，陳秀惠等人後來的思想變化也是如此。這樣的心路歷程，又一次彰顯了經驗理性的強大力量。但是，我們認為對「陳秀惠們」抱持同情的同時，對他們的言論展開理性的解析也不可或缺。

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陳秀惠們」的言論和行為並不具有任何歷史進步意義。從「反復辟戰鬥小組」到「反復辟學會」，他們對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深信不疑，始終予以積極響應，同時又深感困惑。但由於缺乏真正的主體意識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他們常常糾結於「為甚麼自己錯了」^⑥，並將根由歸咎於自己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他們成立「反復辟學會」的初衷是從事「理論研究」，但實際上他們既無實事求是的意識，也無包容異見之雅量。他們寫文章時，總是從「最高指示」和官方輿論宣傳中尋章摘句；批判別人時，往往採用「樞字眼」的方式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直而言之，他們的「理論研究」秉持的依舊是階級鬥爭的思維邏輯，歸根結底還是政治討伐，與官方毫無二致。上述思想狀況和精神素質，使得「陳秀惠們」更具強烈的悲劇色彩：他們希望致力於具有開創性的「理論研究」，實際上卻一直是官方輿論宣傳的附庸；他們主觀上積極地為最高當局搖旗吶喊、衝鋒陷陣，結果卻遭到最高當局的背棄和打壓。我們對「反復辟學會」的「極左思潮」的定性和闡釋，不應受到專案組指控和1978年平反結論的誤導。專案組指控他們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林副主席」、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小集團」，1978年平反結論說他們「是反對『四人幫』及其餘黨而受到政治迫害」，這些話語都受制於特定時期的現實政治需要，都在相當程度上歪曲和掩蓋了事實真相。

但對於「反復辟學會」所代表的「極左思潮」，依然有進行深入考察與剖析的必要，因為這種類型的「極左思潮」在當時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特定時代許多幹部和群眾的精神素質與思想狀況。作為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這裏需要探討的問題是：這樣的精神素質與思想狀況緣何產生？我們想強調的是，從中長時段的歷史視野看，毛時代無疑是一個嚴重的思想荒漠化的時代，高度的「一元化」管控和嚴密的信息封鎖導致一般社會民眾思想資源極度匱乏，強大的意識形態宣教導致青年一代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願卻無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文革前期不大可能產生帶有啟蒙主義性質的自覺的、理性的反抗強權的意識和行動。即使是文革中後期出現的反文革社會思潮，也主要基於人們的經驗理性和對某些具體政策的反感。啟蒙主義觀念在中國的真正復興，要延至文革後的1980年代。

此外，這項研究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史學研究的一個獨特優勢在於歷史的後見之明。當然，這種後見之明有賴於歷史資料的完整性和系統性，以及我們對這些歷史資料的認真梳理與對完整事實的真實還原。以這項研究為例，在我們將當年流行話語中的「新思潮」、「極『左』思潮」、「反動思潮」等概念轉換成學術研究概念時，顯然有必要依據歷史事實對其進行恰如其分的重新界定與命名。因此，我們建議將是否具有思想史意義上的原創性，以及是否代表了特定社會階層的真实利益訴求，作為重新界定和命名這些社會思潮的客觀依據。如果某種社會思潮確實具有思想史意義上的新內容，或者確實能夠真實反映某些特殊社會群體的真实利益訴求，我們便統一地稱之為「新思潮」、「異端思潮」；如果某種社會思潮直接濫觴於文革主流意識形態，主觀上也積極服務於文革主流意識形態，我們便統一地稱之為「極左思潮」（其實是假的「新思潮」、「異端思潮」）。這樣的重新界定和命名不僅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學術紛爭，而且可以拓展與深化我們對文革期間政治衝突的認知。（本期續完）

註釋

- ① 〈中共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1967年4月1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內部發行，1988)，頁389。
- ② 〈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人民日報》，1967年4月2日，第1版。
- ③ 〈中央軍委命令〉(1967年4月6日)，載《「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頁390-91。
- ④ 紅衛兵新復旦師臨時指揮部：〈紅衛兵新復旦師臨時指揮部公告〉(1967年4月4日)，《新復旦》(復旦大學《新復旦》編輯部)，第26期(1967年4月7日)，第2版；反逆流指揮部：《反逆流指揮部工作小結(初稿，討論稿)》，打字油印件(1967年5月16日)，頁1。
- ⑤ 「反復辟戰鬥小組」：〈國際的希望在中國——紀念毛主席的馬列主義文獻《炮打司令部》發表八周年〉，抄件(1967年4月5日)，頁5、6。
- ⑥ 「反復辟戰鬥小組」：〈偉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雷鳴——熱烈歡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誕生〉，抄件(1967年4月20日)，頁8-9。
- ⑦ 陳秀惠：〈「反復辟學會」的由來——「學會」回憶材料之一〉，手稿(1977年1月2日)，頁3。
- ⑧⑩⑭⑲ 「反復辟學會」：〈「反復辟學會」創立宣言(草案)〉，打字油印件(1967年8月5日)，頁4；4；2；1-2。
- ⑨ 「反復辟戰鬥小組」：〈致中央文革的同志們的信〉，手抄件(1967年9月)，頁3。
- ⑩ 詳見〈致《紅旗》、《人民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編輯部的信〉，抄件(1967年9月)；〈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宣組辦公室的信〉，抄件(1967年9月)；〈致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的信〉，抄件(1967年9月)；〈致徐特立、蔡暢同志的信〉，抄件(1967年9月)；〈張鵬飛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抄件(1967年9月)；〈「反復辟學會」情況介紹(草案)〉，打字油印件(1967年10月10日)；〈「反復辟學會」的請示報告(草案)〉(1967年10月10日)，載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編印：《公布「反復辟學會」反革命小集團的一批材料(內部材料，供批判用)》，鉛印件(1970年6月)，頁21-36。
- ⑫ 「反復辟學會」：〈「反復辟學會」情況介紹(草案)〉，頁2。
- ⑬ 陳秀惠：〈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抄件(1967年9月)，頁6。
- ⑭ 「反復辟學會」：〈中國共產黨綱(草案第一稿)〉，打字油印件(1967年12月)，頁2。
- ⑮ 文武兵：〈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嘴臉〉，打字油印件(日期不詳)，頁4。
- ⑯ 「反復辟學會」殷紅：〈必須研究「清君側」〉，打字油印件(1967年10月14日)，頁1-2。
- ⑰ 「反復辟學會」烽火：〈炮打私司令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打字油印件(1967年10月16日)，頁1-4。
- ⑱ 〈「七月風暴」與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手抄件(約1967年10月)，頁1-4，陳秀惠提供。
- ⑲ 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前言〉，載《公布「反復辟學會」反革命小集團的一批材料(內部材料，供批判用)》，頁1-4；復旦大學政宣組：〈目錄〉，載復旦大學政宣組編印：《革命大批判文選》，第六冊，鉛印件(1970年6月)，頁1-2。
- ⑳㉑ 「反復辟學會」、「反復辟戰鬥小組」：〈「反復辟學會」的請示報告(草案)〉，頁32、24；35。
- ㉒ 〈「反復辟學會」骨幹成員俞正梁、夏兆敢的兩份交代材料(摘錄)〉，載《公布「反復辟學會」反革命小集團的一批材料(內部材料，供批判用)》，頁66。
- ㉓㉔ 參見董國強、樊建政：〈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個案：上海「反復辟學會」(上)〉，《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6月號，第四節；頁66，表1。

- ⑳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07-31。1968年1月，湖南「省無聯」被中央嚴令取締；2月，上海「中串會」遭到批判；2、3月間，武漢「決派」聯絡站停止活動；3月，山東「渤海兵團」遭取締。在此背景下，「反復辟學會」最終於2月底決定散夥。
- ㉑ 「反復辟學會」、「反復辟戰鬥小組」：〈「反復辟學會」的請示報告（草案）〉，頁32；陳秀惠訪談，福州，2012年8月14日。
- ㉒ 「反復辟學會」：〈「反復辟學會」給市黨章修改小組的信〉，鉛印件（1968年1月），載《公布「反復辟學會」反革命小集團的一批材料（內部材料，供批判用）》，頁58。
- ㉓ 「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復旦戰報》編輯部：〈關於反動組織「反復辟學會」的第一批材料〉，《復旦戰報》（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師《復旦戰報》編輯部），第40期（1968年3月25日），第4版。
- ㉔ 〈「七月風暴」與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頁2-3；「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復旦戰報》編輯部：〈關於反動組織「反復辟學會」的第一批材料〉，第4版；何蜀：〈「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669-83。
- ㉕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154；上海市公安局：〈劫後逢春〉，載《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上冊（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頁114。
- ㉖ 〈行動起來，向反動思潮宣戰〉，《復旦戰報》，第34期（1968年3月12日），第1版。
- ㉗ 復旦革委會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砸爛「反復辟學會」，揪出復旦變色龍——關於徹底批判「反復辟學會」的通知〉、〈把「反復辟學會」揪出來示眾〉，《復旦戰報》，第40期，第1版；「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復旦戰報》編輯部：〈關於反動組織「反復辟學會」的第一批材料〉，第2、3、4版。
- ㉘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和「反復辟學會」的破產〉，《復旦戰報》，第41期（1968年3月26日），第1-6版。
- ㉙ 陳莊：〈揭開「反復辟學會」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真面目〉，載《革命大批判文選》，第六冊，頁2。
- ㉚ 「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復旦戰報》編輯部：〈關於反動組織「反復辟學會」的第二批材料〉，《復旦戰報》，第61期（1968年5月30日），第1版。
- ㉛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種反動思潮資料彙編（二稿）》，抄件（1970年1月），頁75-77，李遜提供。
- ㉜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纂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未刊稿（1992年），頁527。
- ㉝ 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前言〉，頁1-4。
- ㉞ 復旦大學政宣組：〈目錄〉，頁1-2。
- ㉟ 復旦大學「反復辟學會」專案組：〈前言〉，頁2；復旦大學政宣組：〈目錄〉，頁1-2。
- ㊱ 「反復辟」戰鬥組：〈徵詢「反復辟學會」報頭〉、〈「反復辟學會」骨幹成員俞正梁、夏兆敢的兩份交代材料（摘錄）〉，載《公布「反復辟學會」反革命小集團的一批材料（內部材料，供批判用）》，頁42、61。
- ㊲ 李元茂訪談，上海，2013年6月21日；徐志新訪談，上海，2016年4月12日；陳秀惠：〈致蘇振華同志的信〉，手稿（1977年4月4日），頁9。
- ㊳ 上海市公安局：〈關於對陳秀惠同志問題的複查意見〉，打字油印件（1978年3月21日），無頁碼，陳秀惠提供。
- ㊴ 陳秀惠：《申辯書》，手稿（1970年1月），頁9，陳秀惠提供。

董國強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樊建政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